

孫中山先生傳

于右任題

高良佐 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孫中山從革命中走來，從革命中離去，不但是中華民國的開創者，而且在近代世界史上也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人物。他追求真理，與時俱進，尤其是晚年，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促使中國革命走向新的高潮。他一生清貧儉樸，逝世後所留僅衣服、書籍而已，高尚的品德和偉大的人格，堪稱時代的楷模和表率。



在民國時期為數千餘種的有關孫中山論著中，高良佐所著《孫中山先生傳》，注重整體，敘事比較確切扼要，剪裁適當，條理明晰。作者不專宥于局部的材料，廣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資料，并經過認真考訂，基礎較為深厚……

高良佐 著

孙中山先生传

SUNZHONGSHAN
XIANSHENG
ZH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先生传/高良佐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6-03375-5

I. 孙... II. 高... III. 孙中山 (1866~1925)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479 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封面设计:徐晋林

孙中山先生传

高良佐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3375-5 定价:28.00 元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

(代序)

尚明轩

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因此使不少学者潜心于对他的研究,成为民国时期学者以至政治家所关注的热门课题。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过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的系统回顾,对加深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的了解,以及使今日研究者从该时期研究中的经验教训里取得借鉴,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

对一代伟人孙中山的研究,民国建立之前就已启动,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的荡虏丛书之一的《大革

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方向,尤侧重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的探索。论著丰富,著有《孙中山传》、《廖仲恺传》、《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等。

命家孙逸仙》一书^①，开孙中山研究之先河。这本书，是黄中黄（即章士钊）从日人白浪庵滔天（即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之梦》^②一书中，摘录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之内容译编而成的60页小册子。书中简要介绍孙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义的历史，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③它出版后，不胫而走，广为传诵，使国内不少人读后有了清楚的认识，“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④，于是推崇、归心孙中山者日众，“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⑤。从而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发动和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产生过颇大的积极影响。有一学者为文，甚至认为该书的“刊行，终于完成了建立民国之大业。”^⑥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该书有着巨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当时，此书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与同年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一起列为禁书。

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为孙中山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孙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被加以研究和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民国史中，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孙中山的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著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著（包括生平、事业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军事、法律、文教等思

①此书1906年易名为《孙文历史》，由国民书局出版。

②此书又译名《三十三年落花梦》，由金一（金松岑）译，上海国学社1903年出版。日文本由日本国光书房远藤荣治印行。

③《大革命家孙逸仙·自序》，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0页。

④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第235页。

⑤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03页。

⑥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第235页。

想)1150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文章860多篇^①。

当时的孙中山研究,大体可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16年为初始阶段,后段22年为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互有异同,先后相继。

在初期阶段,通过1912年民国建立,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促使孙中山研究和出版有了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一项重要的课题。在此期间,所出版的一批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各种文集、资料之类的书籍,如高尔柏、高尔松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出版)、陈安仁的《三民主义的连环作用》(中国国民党西澳普扶分部1922年出版)、甘乃光的《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范体仁的《中山先生之生与死》(上海光明书局1927年出版)和伍达光的《孙中山先生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以及多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等等,都是一些孙中山本人的著作和有关孙中山的小册子,整体研究呈现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书中论述比较简单,多为节录报刊摘编而成,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比较粗疏浅薄,并且基本上还是从政治上纪念和评价孙中山,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读物,仅有个别著作渐有学术性。也有少量由于作者政见不同,出现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历史,如《孙文小史》(1913年环简页版)和《孙逸仙及国民党之来历》(新中国社1938年出版)的字里行间充满对孙中山的攻讦和诋伤,明显地带有敌意和偏见。尽管如此,但这阶段的工作却具有开拓的性质,为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

到第二阶段,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此后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活动的推动,孙中山研究走上快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显示出三个特点:其一,除有更多的

^①此项统计,系根据《孙中山研究总目》(团结出版社,1990年)和《孙中山著作及研究书目资料索引》(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979年编印)。凡一书数版者,均不重复计算。

个人写书外,一些机关团体和官员也加入这一行列,从民修书发展到官修书。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编写了《孙中山先生年谱》,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于1941年编写了《三民主义问题》等。这些官修著作编写内容一般,质量不如民修著作。此外,还先后创办一些有关孙中山的学术刊物,如孙科于1934年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用很厚篇幅刊登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陈布雷于1940年创办《三民主义半月刊》(1942—1948年间由杨玉清接任主编),刊载李宗黄、邓慕韩、冯自由、邹鲁、戴季陶、梁寒操、张其昀、张继、钱穆、朱学范、钱端升、贺麟、谭平山等人许多论文,其中有不少是与孙中山研究相关的论著,都直接、间接地对孙中山进行了研究。其二,在征集、整理和出版孙中山著述的文献资料方面,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在先后出版的近200种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孙中山全集、文集和选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拯寰的《孙中山全集》四册(三民公司1929年出版)、胡汉民的《总理全集》五册(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和黄季陆的《总理全集》三卷(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出版)等。这一工作为研究孙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三,研究领域的明显拓展,各种形式的孙中山研究著作纷纷印行,较前一阶段有大幅度的增长,并陆续呈现出若干较有分量、具有学术价值的巨幅专著。诸如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陈安仁的《孙先生之思想及其主义》(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出版)、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正中书局1947年出版)和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著、徐植仁译的《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出版)等书,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当时以至今日历史学者所重视。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孙中山研究已有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课题研究体系。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衰败,孙中山的研究和出版日趋寥落。

在民国时期为数达千余种的众多论著中,参差不齐,其中写得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充实,具有较多参考价值者,简述若干种如次:

(1)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是较好的著作之一。全书把孙中山历史分为10个部分,共34节。作者曾追随孙中山左右多年,他为撰

写该书还和孙中山在上海等地“同居一室”，共同“费了许多日子搜集资料”^①。由于得到孙中山及其家属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帮助，使用大量的口碑资料，引述许多“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经过的重大政治事件”^②，尤其是对孙中山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叙述颇详，很有价值；并且文字生动，描写细腻，引人入胜。特别是对孙中山联俄、容共一事，议论亦尚平允。所以，该书 1926 年出版后曾不断再版。它的最大缺点是，在分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往往荒谬地归之于宗教神学的启示，力图把孙中山塑造成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充满唯心史观。

(2) 罗香林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以博引繁征、资料搜罗丰富取胜。书中使用了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许多原始资料，如西医书院学生注册簿、学生成绩簿，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妇产学、外科学、医学等门考试成绩单与第一学年各科分数表，以及当时香港《德臣西报》、《南华邮报》等的报道，并经过认真地排比、考证。它写得相当扎实，对研究孙中山的早期活动、医术和反清革命思想，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但该书在某些史事的叙述上，如对孙中山的学位说法不一等，不够缜密；某些问题如对孙中山入香港西医书院的时间及修业年限等，论证失当；并存在有像当时其他孙中山著作一样的无限拔高孙中山思想的通病。

(3) 高良佐所著《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体，叙事比较确切扼要，剪裁适当，条理明晰。作者不专宥于局部的材料，广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资料，并经过认真考订，在完成孙中山世系、兴中会等专题研究后成书，基础较为深厚。不足之处是，引用资料多未加标注，难以稽考；下限写至 1912 年，未能续完全书。

(4) 胡去非编的《总理事略》（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 1937 年出版）和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也写得比较严谨。作者长期致力于史事的考订，用力颇勤。它们的特点，都是以孙中山《建

①[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序》，上海三民公司，1926 年，第 2～3 页。

②[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序》，上海三民公司，1926 年，第 2～3 页。

国方略》中的《有志竟成》(即《革命缘起》)一书为纲,以史事为纬编织成书。这两本书,是民国时期我国史学者写孙中山传时共同奉行的注经式传记写法的代表作。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当时,延安和大后方的一些认真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受到当时种种客观条件和不良环境的限制,还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各个角度对孙中山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出了一定成绩。如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出版)、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新中出版社1940年出版)和侯外庐的《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长风书屋1946年出版)等书,都曾程度不等地对后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篇幅仅72页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着眼于中国革命的整体,把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放在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分析考察。指出其一生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中所包含着的弱点,写出了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转变阶段不断奋斗前进的可贵精神。该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写作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最初尝试,属于开创性成果,曾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孙中山研究起了启发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综观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者的著述,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及学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亦可谓不少。主要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首先,由于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指导,把孙中山神化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似乎孙中山的伟大气质和革命思想与生俱来,且一直没有发展变化。

在一些学者,特别是官方或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者的论著中,几乎都把孙中山个人作为中心,充满英雄史观和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气息,不能从孙中山活动中看到历史的要求,看到一个时代,体察不出时代跳动的脉搏,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造成了孙中山的活动与时代脱节,同政党、群众分离,其思想发展也毫无规律可寻。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一些学者出于辛亥后政潮迭起、派系纷争的变化,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意抬高孙中山的地位,于是不顾历史真相给以许多溢美、拔高之词。如把孙中山描述为从小就是一个具有伟人气质的神童,指出孙中山“幼时,体颀貌端,气度温和,有若书生。而魁梧英武,使人见之生畏”^①。认为:孙中山“先生之生也,体颀貌端,绝似杨太夫人;气度温和崇厚,对人慈悦若亲,勇于做事,无不良嗜好,又极类道川公。”因此,他“貌像娘,贵极品;性如爷,位极顶”,是位天生的伟人^②。并明确指出:孙中山“幼时所为,多令父老咋舌,盖具革命性早已显露矣。”^③还有从翠亨村周围的地理环境和“风水”,来解释孙中山这一历史伟大人物的所以能够产生等,刻意把孙中山神化起来,树为偶像。无怪乎多年之后还有人为文慨叹地说: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于孙中山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我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化,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生动的完整的而百读不厌的”孙中山传记著作^④。

孙中山确是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的一代伟人,但他也和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都是现实社会和时代的产儿。因为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就把他神化,甚至奉为神圣的偶像,加以膜拜讴歌,这和离开历史实际和时代条件,贬低乃至忽视、否认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中国人民所作的伟大贡献一样,都是非科学的,也是远离历史实际的表现。史学的生命和力量所在是翔实可靠,远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有价值的。

其次,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掩盖或歪曲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发展,曲解三民主义学说,无限夸大“革命程序论”和“权能区分论”。

从国民党“一大”到孙中山逝世,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孙中山革命思想有重大发展,他主张“联俄、容共、扶助农工”,首创国共合作,呕心沥血于国家的统一大业,伟绩烜赫,

①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2页。

②胡去非:《总理事略》,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书,1937年,第3页。

③甘乃光:《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第45页。

④台湾传记文学社:《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传记文学》第7卷第5期。

利国利民。然而,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国民党建立的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俄、中共抱敌视态度,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成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党史研究中的一个忌讳的话题,成为“禁区”。在很长时期内,在孙中山研究的大量论著中,对孙中山晚年的辉煌史不仅罕有专门的论著,而且对这段历史或语焉不详,或只字不提,甚至肆意歪曲事实。如提出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能积极活动,若使之游闲党外,恐有碍于国民党之工作,乃允许而容纳之”^①。又说孙中山因为共产党人“声明服膺国民党的主义,所以很宽大的容纳了他们”^②,等等。并且,对于与此有关的资料,如孙中山的宣言、函电等亦极少披露,在颇有分量和影响的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中,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收录。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揭橥的政治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并且它在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民国时期,很多学人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论著。其中最突出的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兴学会 1935 年出版)、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 1925 年出版)、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上海新生命月刊 1928 年出版)、叶青的《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重庆青年出版社 1945 年出版)、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5 年出版)、刘炳藜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重庆中央周刊社 1940 年出版)和杨幻炯的《三民主义概论》(上海民智书局 1928 年出版)等等。这些著述,各人研讨的角度虽有不同,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也各异,见仁见智,互有分歧,但几乎都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继承者,其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意图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国思想界曾产生过消极的不良影响。学术研究旨在探求真理,为了政治目的而不面对现实,面对真

①胡去非:《总理事略》,第 260 页。

②蒋星德:《国父的一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0 年,第 348~349 页。

理,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只能是歪曲和谬误,这是为识者所不取的。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将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权能区分论”,是孙中山把人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权”与“能”因人的不同而“区分”,是对待人民群众的偏见。它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把权与能机械地加以分割(所谓有权无能和有能无权),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林桂园的《国父政治思想体系》(重庆现实出版社 1945 年出版)、何会源的《孙宪精义》(原名《论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央政治制度之设计》,出版年份不详)、黄旭初的《民权主义概要》(上海世界书局 1929 年出版)、张铁君的《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2 年出版)等书,以及相当多的论文中,在此“两论”问题上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毛病。它们甚至利用和夸大“两论”中消极因素及理论弊病,为蒋介石强化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寻找理论根据,使之能打着“万能政府”的旗帜,将全国人民置于“阿斗”的无权地位,借以剥夺人民应享有的权利。这种研究方法,全在迎合政治形势,论述畸轻畸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对孙中山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第三,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论探求。

几乎所有的论著,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著述中,多属于史事的概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很少涉及当时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没有把孙中山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体例也几乎是各家一致,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仅摆出一大堆历史现象,流于资料罗列,类如长编记事,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更有不少是国民党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和历史偏见的应景、应时之作,其内容乃至文字颇多雷同,缺少创见和新意。就是在具有较多参考价值的著作中,也由于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见解,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已注明者也明显地看出史源不足。所以,它们虽保存和整理了某些方面多少有用的史料,

却很难说是科学和严谨的学术著作。

回顾民国时期对孙中山的探索和研究,38年间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出版物中,种类最多的还是介绍孙中山事业、思想和活动的各种传记、生平,以及三民主义等类书籍。从学术内容而言,基本上还是处于初阶,较为单薄,并且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为时人与今人乃至后人提供了某些借鉴和参考。例如在处理现实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上,就有颇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我们从当时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时代范畴来说,孙中山研究是属于当代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国统治后,孙中山研究基本上又被纳入国民党党史的范畴,为蒋介石集团宣扬其正统观念服务。不少史书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往事面目皆非,背离历史真实。在研究目的上,较多的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在研究内容上,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甚至把历史与现实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更有甚者,为着现实政治的需要,突出现实性,只注意适合需要的材料,不是全面地占有和研究材料,却忽略乃至违背科学性。正由于孙中山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政论性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蒋介石集团的巩固起了作用。毫无疑问,学术研究当然要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努力发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一取向是没有问题的,值得肯定的。但如何把现实性与科学性正确地统一起来,从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的现象观察,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很值得从凸显出的经验教训中引以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研究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它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目前的孙中山研究,已有雄厚的基础与很高的起点,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正在向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方向发展。回顾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给予重新审视和思考,对今天的孙中山研究者来说,“温故而知新”,也是不无意义的。

2006年1月于北京寓所

一部有特色的孙中山传记

段云章

应该说,我与高良佐著《孙中山先生传》有些缘分。45年前,我当了中外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的研究生,陈师要求我多读书,在给我开的一长串需读参考书目中,就有这部传记。我好不容易从中山大学旧书库中找到了这个孤本,读后颇有所获。我向陈师汇报了读后感,那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举批判资产阶级之时,陈师刚经历过“拔白旗”的批判,但他仍然对我说:“很好!这部书确是写得较扎实,有特色,值得一读。”本着这一深刻印象,我于上世纪90年代参与主编《孙中山辞典》(199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就约请存有此书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一位先生撰写此书的介绍条目,列入该辞典的《孙中山研究论著、史料汇编简介》中。再过10年,同窗老友刘纬武先生转赠我一本刚翻印出版的此书;不久纬武又介绍我与此书著者的贤嗣高宁人先生见面。高先生向我介绍了其父长期孜孜于从事国民党史和孙中山研究的艰苦阅历,高宁人先生又从上海到广州,告以此书将再版,望我写一篇“序”。面对前辈硕著,岂敢言“序”,但作为与此书长期结缘的热心读者,写点读后感,

段云章:中山大学教授。曾任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兼广东孙中山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以及《中华民国史丛书》、《孙中山研究丛书》编委。长期致力于孙中山研究,著述丰富,著有《孙中山》、《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等。

却也情不可却,义不容辞。

这部孙中山传记之所以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孙传联翩纷出之后,仍然令人注目,仍须再版以飨读者,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至今还值得回味的如下特色。

首先,著者虽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也较好地理解到时代潮流、社会环境和伟人言行的互动关系。此书的第一章就明确表述,孙中山之出现是“因为时会之所以转移,潮流之所激荡,自然会诞生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做新时代的开创者”;孙中山之所以适应时代潮流和人群需要,决心改变现状,改造中国,是“他到处静默地观察,便发生了改造中国的宏愿,终究因他所处的环境发展了他领袖的精神,……他这种救国救民族的志愿,潜伏在他的意识之内,有一种压力似的逼迫着他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前进”。而当他成为一位革命开创者之后,又以他的非凡智慧和能力,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这种正确的治史观,贯串于全书之中。基于此,著者没有囿于党派之见,谈论孙中山言行的上述特点时,毫无忌惮地引述马克思、列宁的类似情况作比照。

其次,著者本着他自定的治史须“根据事实,加以论述”和“实录直书”的原则,在撰著此书前,利用其先后师事研究国民党和孙中山历史多年并卓有成就的邵元冲、黄季陆先生,以及著者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长期工作的条件,广泛地阅读了有关孙中山的已刊和未刊的史料;对不清楚之处,还请人作了实地调查;对一些问题还做了认真考证。如此辛勤笔耕,历时20年。其写作提纲亦广泛征求同行意见,数易其稿。写作时,又对所搜集整理的大量史料,结合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些人的论述,多加比较研究、核实利用。这就是使得这部传记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孙传相比较,显得立论有据,比较扎实,内容也较为丰富。

再次,由于著者对孙中山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而又作了长期研究,因而这本传记写得比较系统,其中不少精到论述,特别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轫和早期思想的演进,写得较细致,而且很富感情,基本上勾画出了孙中山的言行特点和早期形象。而著者的生动、

平实的笔调,又增添了此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诚然,孙中山研究是不断深入、发展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类档案、报刊资料的大量发掘与整理,与孙中山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各种结集陆续有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推陈出新,因而使孙中山的文集、年谱、传记、论文以及各种资料结集纷纷问世,有如百花竞艳、各极其致,真是日新月异,美不胜收。于此回眸前此有关著作,自必有其时代局限和缺陷。又由于此书是在许多中外重要史料尚未充分发掘的情况下撰写的,因而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人际关系,缺乏更完整、更清晰、更准确的论述,孙中山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也就展现得不够完整。此书由于种种具体原因未能将立论的史料标明出处,又使这些立论不够明白和有力。著者对孙中山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在那样错综复杂、诡谲多变的情势下,有其缺点和错误自是难免,但此书极少指出,更欠剖析。尽管如此,此书诞生于战乱年代,能写得如此有特色,历久而未衰,迄今在孙中山研究学术史上仍保有一席之地,确是难能可贵。现此书在久已绝版很难找到一阅的情况下将予再版,对读者自是一件乐见幸事。

2005年6月于中山大学

高良佐《孙中山先生传》读后感

刘纬武

我父亲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生，一直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工作；我母亲是广州执信中学创校学生，1925年被选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他俩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因此，孩提时，我已不断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国父、总理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五岁，我已能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会唱《总理纪念歌》“我们总理，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稍长，我在重庆进入黄埔子弟学校（后改名为中正学校）读书，每逢星期一纪念周，都有校长或邀请社会名流、学者、作家、艺术家莅校讲演，内容常常涉及孙中山先生。从此，我心目中，很自然地把中山先生从感性上当作我的偶像，我最崇拜的、中华民族首屈一指的伟人。

1956年至1960年期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经过思考、分析、判断与推理，从理性上重新认识中山先生，我心目中，仍然把他当作我的偶像，我最崇拜的、中华民族首屈一指的伟人。

我的老战友，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工作时的同事高宁人同志，于2003年重印了他尊大人高良佐先生著的《孙中山先生传》，嘱我转赠中山大学、广州中山图书馆及一些研

刘纬武：香港逸仙学院教授。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世纪双周刊》总编辑。